

荷索《热浪》中的人类纪、超物件和气候伦理学

The Anthropocene, the Hyperobject, and Climate Ethics in Arthur Herzog's *Heat*

蔡振兴 (Robin Chen-Hsing Tsai)

内容摘要：20 世纪六十年代气候小说的再现中，巴拉德 (J. G. Ballard) 的小说《淹没的世界》(*The Drown World*) 想象一个由于地球南北极磁场失衡而导致的暖化世界；相反的，七十年代的暖化小说家荷索 (Arthur Herzog) 的《热浪》(*Heat*)，则是第一本以科学研究为依据，讨论“二氧化碳”所引起的暖化灾难：金星状态 (Condition Venus)。小说的主要人物皮克 (Lawrence Pick) 是一位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科学家。为了解决全球暖化的政治、社会和伦理等问题，他和危机工作小组 (CRISES, Crisis Research Investigation and Systems Evaluation Service) 的成员，共同致力于灾害防治。晚近，生态学者莫顿 (Timothy Morton) 提出超物件 (hyperobject) 概念来重新思考全球暖化议题，并将全球暖化视为一种“超物件”。对莫顿而言，超物件有五大特色：(1) 黏稠、(2) 非定域性、(3) 时间振动、(4) 阶段性发展和 (5) 互物性。本论文试图以荷索的《热浪》为例，以超对象为方法论，重新探讨人类纪、生态危机、风险理论和气候伦理学等相关的新物质主义生态论述。

关键词：荷索；《热浪》；莫顿；超物件；人类纪；气候伦理学

作者介绍：蔡振兴，台湾大学外国文学博士，现任淡江大学英文系教授、文学与环境学会理事长，以及《英美文学评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理论、史耐德研究、全球暖化论述、生态文学与文化批评，以及世界文学。

Title: The Anthropocene, the Hyperobject, and Climate Ethics in Arthur Herzog's *Heat*

Abstract: In the reappearance of climate fiction in the 1960s, J. G. Ballard's novel *The Drowned World* envisions a warming world caused by a lack of balance in the earth's north-south magnetic field. Contrariwise the 1970s' climate change fiction, Arthur Herzog's *Heat*, then is the first novel that uses scientific research as its base when discussing a carbon dioxide induced warming disaster: Condition Venus. Lawrence Pick,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novel, is a scientist who graduated from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thical problems of global warming, he together with members of CRISES (Crisis Research Investigation and Systems Evaluation Service) jointly make efforts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the past few years, ecologist Timothy Morton has put forth the concept of hyperobject to reconsider the problem of global warming and takes global warming as a kind of “hyperobject.” For Morton, a hyperobject has five main characteristics: (1) viscosity, (2) nonlocality, (3) temporal undulation, (4) phasing, and (5) interobjectiv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Herzog’s *Heat*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theory of hyperobject to renew discussion of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crisis, risk theory, and climate ethics within the new materialist ecological discourse.

Key words: Arthur Herzog; *Heat*; Timothy Morton; the hyperobject; the anthropocene; climate ethics

Author: Robin Chen-Hsing Tsai is Professor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mkang University(New Taipei 25137,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literary theory,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rnchtsai@mail.tku.edu.tw

导言：人类纪

“人类纪”（the Anthropocene）一词是克鲁岑（Paul J. Crutzen）和史多默（Eugene F. Stoermer）在2000年的一篇论文“人类纪”（“The ‘Anthropocene’”）所提出的概念。¹ 鉴于人类近三百年期间对地球上的资源过度使用，导致地球于地文、水文和天文等系统上出现失衡现象，包括都市化（全球约有三到五成的地表面供人使用）、石化产品的使用、对大气层和地表排放有毒或温室气体等等（Crutzen, “Geology” 23; Trexler 1）。对两者而言，尽管有批评家认为气候改变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人为的，但自从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活动对全球的影响是显著的”（Crutzen 16），而且人类对地理、地表和地景的影响（Kellogg 16），其扮演的角色已经超乎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人类现在改变自然的力量已远超过以往自然可以改变人类的力量。同样的，克鲁岑在2002年的“人类的地质学”（“Geology of Mankind”）一文中，重申这一立场，深深同意意大利地理学家史多帕尼（Antonio Stoppani）的观察：人类的普世权力代表着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影响这个世界。与大地相比，这股力量

1 此文后来收录于 *Earth System Science in the Anthropocene*, ed. Eckart Ehlers and Thomas Krafft (Berlin: Springer, 2006) 13-18。崔斯勒（A. Trexler）认为“人类纪”是史多默于八十年代率先使用的词汇（Trexler 239）。

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 (Crutzen and Brauch, “Geology” 23, Crutzen and Brauch, Paul J. Crutzen 211-12)。对他而言, 1784 年瓦特 (James Watt) 发明蒸汽机之后, 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渐增, 该年可视为“人类纪元年”。因此, 我们的时代又成为“人类纪时代” (The Era of the Anthropocene) (Crutzen and Brauch, “Geology” 23, Trexler 1)。

事实上, 克鲁岑在上述所提到人口、生态、污染和海平面上升等问题, 下列作家也不约而同指出类似的症候。艾尔利希 (Paul Ralph Ehrlich) 早在 1968 年发表《人口炸弹》 (*The Population Bomb*), 论及人口增长、食物短缺、星球灾难和资源匮乏之间的联动关系。1972 年, 梅多斯 (D. H. Meadows) 和来自罗马俱乐部等学者撰写《成长的极限》 (*The Limits to Growth*) 以响应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同样的, 七十年代, 美国生态诗人史耐德的“四大改变” (“Four Changes”), 针对人口、污染、消费和改变等四大主题做出相关的响应 (Snyder 91-102)。八十年代, 马基本 (Bill McKibben) 的《自然的终结》 (*The End of Nature*) 宣称自然的终结是“人为的”。和克鲁岑一样, 在论述中, 这些作家对人类改变地球现状的事实深表关切。比较可惜的是, 部分学者的观察“道德主义”意味浓厚, 其封闭的“环境末世论”也广为 (生态) 批评家诟病。然而, 即便在行文中“拟人法”或“化人主义”的修辞学, 带有“情感谬误” (affective fallacy) 的倾向, 这些学者在叙述策略上还是点出“人文主义”的局限性, 对人类纪的未来抱持着保留的态度。

今天, “人类纪”一词的使用潜藏着“人本中心论” (anthropocentrism)、 “人类例外主义” (human exceptionalism) 和“物种主义” (speciesism) 等负面意涵, 而且有关人类纪的描述也一直都是气候小说的主题。六十年代巴拉德 (J. G. Ballard) 的小说《淹没的世界》 (*The Drown World*) 想象一个由于地球南北极磁场失衡而导致的暖化世界; 相反的, 七十年代的暖化小说家荷索 (Arthur Herzog) 的《热浪》则是第一本以科学发现为依据的科幻小说, 讨论由“二氧化碳”所引起的全球暖化灾难。主人公皮克 (Lawrence Pick) 是一位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 为了解决全球暖化的社会问题, 他和危机工作小组 (CRISES, Crisis Research Investigation and Systems Evaluation Service) 的成员, 共同致力于解决人类纪所带来的暖化问题。晚近, 生态学者莫顿 (Timothy Morton) 提出超物件 (hyperobject) 概念重新思考全球暖化议题。对莫顿而言, 超物件有五大特色: 黏稠 (viscous)、非域性 (nonlocal)、时间振动 (temporal undulation)、阶段性发展 (phasing) 和互物性 (interobjectivity)。本论文试图以荷索 (Arthur Herzog) 的《热浪》 (*Heat*) 为例, 以超对象和相关面向对象哲学为方法论, 重新开启对人类纪、生态危机、风险理论和气候伦理学等相关新物质主义的生态论述。

一、何谓超物件?

在《超物件：世界末日后的哲学与生态学》（*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一书中，美国生态学者莫顿（Timothy Morton）援用面向对象理论中的“超对象”视角，重新诠释全球暖化的议题。本书可视为第四波新物质主义或面向对象理论的代表作之一，与此领域相似的其他学者包括哈门（Graham Harman）、拉图尔（Bruno Latour）、布莱恩（Levi Briant）等。¹ 莫顿与哈门的想法接近，两人认为对象的主要特点为其“告退性”（withdrawal）。² 莫顿的超对象理论更是哈门对象理论的极致表现。对他而言，超物件有五大特色。³

第一、黏稠。对莫顿而言，油田、生物圈、太阳系、核子废料、铈、铀、保丽龙、塑料袋、资本主义、全球暖化，均可称为超物件（hyperobjects）。这些巨大对象出现于生活之中，其“黏稠的”特质让人无法摆脱。莫顿的超对象一词最早出现于2010年出版的《生态思想》（*Ecological Thought*）（130），在本书中，莫顿反对与“自然”相关的老生常谈理念，如生态模仿论或整体论等等。与拉图尔、瓜达里（Félix Guattari）和飞利浦斯（Dana Phillips）立场一致，莫顿希冀援用“生态理论”来阅读生态文学，寻找生态论述的新动能。另外本书也运用叙述研究（narrative scholarship）策略，将生态批评做一综述。莫顿这种“超对象”概念不但尝试走出后现代的“雄浑”（the sublime），也尝试超越纪杰克（Slavoj Žižek）的“崇高客体”（sublime object）。传统的雄浑（对象）或美学，例如巨大的大教堂圆顶或伟大的高山，尽管他们能引起痛苦、恐惧和崇高的道德感（Burke 81, Kant 48-49），但与超对象相比，这些描述仍属小巫见大巫，因为超对象的概念可以处理多元宇宙（pluriverse）：它是生态的、社会的、政治的、美学的。⁴

第二、非定域性。这是量子物理学的概念，而蝴蝶效应也是在此概念之内的思考模式。莫顿反对生态论述过度强调“在地性”而忽略“全球视野”。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所谓“镜中物体比所示更近”——看似很近，实则遥远。远与近之间的关系代表“间性”（inbetween-ness），可能意味着“既是……也是”（both ... and ...）或“既不是……也不是……”（neither ... nor ...）的逻辑思考。再者，它是两种真理并存（dialetheism）、共伴（entanglement）。如地球与月亮同伴的关系产生了潮汐，并非前者取消后者的关系。超对象反对单子论或原子论，并认为对象没有内天生特质（no

1 见 *Key Readings in Ecocriticism*, ed. Robin Chen-Hsing Tsai, Serena Chou, and Guy Redmer (Taipei: Bookman, 2015) vii-xix.

2 哈门的对象理论受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影响，有“某物作为……的结构”（as-structure）。只是，哈门的对象理论反对拉图尔的“关系论”或“联结主义”。

3 本节部份内容由台湾师大英语系博士生庄士弘帮忙整理，谨此致谢。

4 从写作的角度来看，莫顿的“暗黑生态学”（dark ecology）主要处理生态论述中“诡异”的极限经验。

intrinsic property): 每个对象并非只存在惰性, 而是皆有其潜能, 尤其超对象在更大的社会或生态系统中可与别的对象互动, 产生“机器式创造联结”(machinic assemblage)。

小说家荷索的《热浪》一开始就引用一则报纸故事来说明全球暖化在各地发生的状况。在故事中, 提督(Tito)、何塞(Jose)、卡洛斯(Carlos)和巧(João)在一艘拖网船上工作。在捕鱼作业时, 提督发现气候变迁让整个海水暖化, 导致渔获量降低。因不明事故, 他们怀疑是否这一切乃是上帝的恶作剧(12), “否则, 噢, 海水怎么会生病呢?” 船上的另一位船员也提到他发现在阳光的映照下, 海水看起来特别红, “简直像鬼魂一般”(13)。¹ 这则报纸上的小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大道理: 暖化正在发生, 是“非定域性”的, 而且在各地已经带来若干症状。

第三、时间振动。传统上, 时间与空间属于不同的范畴, 但从相对论来看, 时间与空间在“面向对象”中, 并非只是空白的载体或无意义的背景, 而是能对客体产生影响。

第四、阶段性发展。对象如月球一样, 有“告退”和“非全”(not-all)的特质。换言之, “人”无法一窥“非人”全貌。

第五、互物性。早在1996年时, 拉图尔(Bruno Latour)即写了一篇文章叫“论互物性”(“On Interobjectivity”), 但文中并没有明确解释。约2005年, 莫顿采用威尔柏(Ken Wilber)的“互物性”概念: 互物性意指东西与东西之间产生互动就会产生意义的平面。再者, 莫顿反对某些生态研究论述中“人云亦云”的说法, 反对生态论述“万物互联”(“Everything is interconnected”)的第一原则, 因而提出“网孔”(mesh)的概念。循着纪杰克的脉络, 即万物皆有“洞”或“天衣有缝”, 有许多不稳定的因子会让系统发生“短路”现象。莫顿的生态论述受到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的影响, 其思想核心为: (1) 生态学没有自然(ecology without nature): 由于受到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的影响, 他将自然划上删除线, 因为他反对将自然美学化; (2) 无物质之生态(ecology without matter): 莫顿反对班内特(Jane Bennett)等学者所提出的“生机论物质”(vitalist matter)具泛灵论(panpsychism)之特质; (3) 无现在之生态(ecology without the present): 超对象理论反对“自然现在主义”和固定的、单一的、和谐的、美好的、整体的本质, 因为超对象强调对象的不确定性(radical contingency), 会在远方或未来发生, 而不是“现在”。

二、超物件与全球暖化

荷索在《热浪》的前言中, 引用下列作家来说明气候变迁主要是人为的: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Arthur Herzog, *Heat* (New York: Author's Choice Press, 1977)。下文只标注页码, 不再一一说明。

(1) 米契尔 (J. Murray Mitchell)、(2) 艾尔 (Robert U. Ayers) 和尼兹 (Allen V. Kneese)、(3) 海柏纳 (Robert Heilbroner)。¹ 米契尔认为, 当代气候不稳定与人类排放二氧化碳至大气层有关, 因此我们应对人类影响现在以及未来的世界气候做比较正确的评估和判断 (156-58)。同样的, 海柏纳 “人类的愿景” (the human prospect) 指出, 地球的温度若持续增加, 将会影响人类的居住 (50-51)。七十年代, 这些有关人类影响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与当前 “人类纪” 的预警论述不谋而合。因此, “人类纪” 论述并非新创的理论, 而是一种提供重新审视人与非人、主体和对象关系的价值重估。

在小说中, 荷索所触碰的暖化议题, 主要是以科学研究的数据来呈现若隐若现的极端气候。与六十年代的全球暖化小说不同, 七十年代的小说指出 “二氧化碳” (CO₂) 才是全球暖化的元凶。六十年代的暖化小说类似 “想象小说” (speculative fiction)。艾迪斯的《热屋》即是一例, 全书描写全球暖化之后, 世界变成丛林, 而且所有的动植物变得巨大无比。巴拉德的小说《淹没的世界》则提出另一种说法: 地球磁场失衡, 因而导致地球自转变慢, 全球温度上升。由上述小说可知, 全球暖化的场景系由这些作家所杜撰出来的, 颇具 “臆测” 空间。不管是艾迪斯或巴拉德, 他们的小说所呈现的暖化原因或世界, 较属想象 (imaginative) 性质。相反的, 七十年代的作家所描述的暖化世界较为科学 (scientific)。荷索的小说《热浪》一开始就描述热浪来袭, 海洋温度上升, 湖里的鱼类大量死亡, 所有东西看起来都是 “黏稠的”; 其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海景, 有怪诞 (uncanny) 和恐怖 (gothic) 的氛围。幸好, 科学家皮克与其研究团队, 开始研究整个世界为何变成如此? 最后他们发现: 这一切乃是二氧化碳所导致的全球暖化和气候改变。于是, 他们试图透过科学解决全球暖化之窘境。

皮克是小说的男主角。他是一位工作狂。因为职业的关系, 他喜欢看电视研究气候。他的上司爱德蒙斯顿 (Rufus Edmunston) 是 “危机中心” 的主任, 皮克则是副主任。尽管在同一中心工作, 两人却不同心; 两人最大的差别是: 前者是气候怀疑论者, 后者是暖化深信者。爱德蒙斯顿是物理学家, 现年六十三岁, 乐观谨慎, 但缺乏对气候的相关知识; 相反地, 皮克是哈佛大学电机和环境工程双硕士, 同时也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博士。他还不到三十岁, 就已经是正教授, 而且曾担任美国太空总署高级卫星专家, 有关生态、太空旅行、能源、科技、计算机或电机, 他样样在行 (20)。

“危机” 小组是 “灾难计划和响应” (Disaster Planning and Response, DPR) 下的部门 (56), 此单位的成立被赋予 “处理、通知、警告” 潜在的环境危机等重要工作。这个危机小组需要跨部门合作, 也必须对 “即将到来” 或 “未来将到” 的灾难, “不管是自然的, 亦或人为的”, 提出因应之

1 详见 J. M. Mitchell, Jr., “A Reassessment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as a Cause of Long-Term Changes of Global Temperature,” *Singer* 149-96; Heilbroner 51.

道。危机研究中心的大厅设有大屏幕，播放“两千年来自然灾害史”的内容（21-23），包括瘟疫、饥荒、龙卷风等自然灾害。中心的座右铭是“未来即是我们的责任”（23）。这个灾难中心也充当高等科学研究讯息转换站（39），其五位成员皆是一时之选的各领域专家（47）：化学家克林教授（Dr. Bertram Kline）；气象学家和计算机模型专家安德森博士（Dr. Harold Anderson）；国家龙卷风研究中心主任芬利博士（Dr. Frank Finley）；透过超级计算机的数据分析气候模型且专门分析军方所提供气象资料的气象专家贝斯特（Murray Baxter）；以及来自南加大的“灾难社会学家”哈步博士（Dr. Rita Havu）。在这些成员中，气象学家安德森博士常穿运动衫和灯芯绒裤，是一位矮胖、常常脸红、长雀斑且讲话语调较高的计算机专家（59）。化学家克林博士最为知名，他主持一项前所未有的“最大科学实验计划”（29-30），研究太平洋热带地区的暖化大气层气象，并拥有40艘研究船帮忙收集资料，供研究用途。有趣的是，克林教授、芬利博士、安德森博士和气象专家贝斯特四人称他们自己是暖化时代的“末世论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Apocalypse）（121）。

“危机”中心拥有一部超级计算机，负责监控“可能会发生的生态修正，不管是好是坏”（47）。这部超级计算机被塑造成拥有女性声音的大计算机，提供中心各种环境信息参考之用。同时，这部计算机也分析地球面对天气改变的各个阶段的因应方式：从阶段一（Earth One）到阶段六（Earth Six）（114-34）。

讽刺的是，尽管危机中心被赋与重责大任，但中心主任爱德蒙斯顿却是一位气候怀疑论者。他认为皮克的做法是把“可能”（a possibility）变成“很可能”（a probability），甚至将全球暖化的现象变成“实然”（a certainty）（92）。然而，皮克响应爱德蒙斯顿的质疑：“鲁弗斯，那么我们该怎么做？一直等待吗？或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呢？该怎么办呢？什么是证据？或许飓风的证据并不是斩钉截铁。我知道，我知道你能找到一群专家来证明两者之间毫无关系。但是，万一两者真的有关系呢？”（92）。

爱德蒙斯顿所代表的正是一般大众对暖化的态度。他们怀疑皮克的暖化说法类似“狼来了”（crying wolf）的口号，不能证明为真，而且是“瞎猜的”（a speculation）（93）。面对皮克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警告，爱德蒙斯顿的反应不外乎是：“我们会尽我们的义务，但同时我们也会不惜一切，承担责任”（93）。

有一天，皮克看到计算机所分析的暖化现象结果，感到非常忧心。他发现二氧化碳“这个东西”的浓度正在攀升。因此，他认为若是气候变迁长期持续下去，最后会慢慢走向“热”反应。之后，他向主管爱德蒙斯顿提及此事，也向其他气象机构谈论此一发现，可惜大家兴趣缺缺：一般人不相信、气象机构不相信，他的上司更不相信。当皮克发现温室效应可能已经达到某种临

界点，他便向上司报告，然而爱德蒙斯顿的反应却是：“我们何不等等，再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未来还是我们的责任”（58）。接着他又对皮克挖苦说：“如果你今天没有找灾难来让自己烦恼，下个世纪也会再找一个”（58）。爱德蒙斯顿认为，皮克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卡珊德拉”（Cassandra），乌鸦嘴，“专说一些没人爱听的话”（58）。

身为核能物理学家，班纳（Joseph Banner）是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班纳是个大块头，身穿有条纹的蓝色西装（136）。和爱德蒙斯顿一样，两人都善于外交辞令，但班纳虚荣心很重，又固执，而且还是一位机会主义者，在五十五岁那年，他还竞选哈佛大学校长。有趣的是，爱德蒙斯顿也想坐上班纳科学顾问的位子。因此，两人共谋，自以为是地封锁由皮克所提供与气候变迁相关的信息，不让总统知道有即将到来的气候乱局。就作为政客而言，这两人相信“总统和他们一样，不信任这种（极端气候的）未来以及认同（皮克）这种未来的人”。然而，皮克始终坚信暖化真相：

……在政府中，这些男人的工作占据最重要的科学职位，就是要告诉总统这种危险情境的可能性。相反地，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好理由延宕，不用改变跑道，就像悲剧人物那样，被自己的行为后果卡住，动弹不得。爱德蒙斯顿只会设法保持乐观的态度，拒绝慎重地考虑皮克的建议。或许班纳应视为犯了更大错误的人，因为似乎他比爱德蒙斯顿更有自信地以为，目前的状况还是绿色情境。但是，身为公众秩序的执行者，这位科学顾问害怕如果“绿色情境”的字眼走漏风声，随之而来的，将是极大的社会不安，而且会让极端主义者掌权。班纳希望总统能够继续竞选连任下届总统。（139）

爱德蒙斯顿是个爱国主义者，希望美国强大，但不喜欢改变美国民众的消费形式，因为他“不希望，也不想”看到美国人民成为“高贵的野蛮人”（141）。事实上，我们可以将爱德蒙斯顿和班纳这些气候怀疑论者视为犬儒者（cynics）或伪善者（hypocrites）。在对象理论中，虽然对象“告退”的特性能带出“诡异性”，而且和其他面向对象学家的想法一致，莫顿认为作为超物件的全球暖化现象是“真实的”（real）（136），但他并不因此就鼓励灾难想象的“末世论”，责难人类罪孽深重，难逃死亡一劫。相反的，它批判“世界末日”（the end-time）的生态意识形态；另外，他也将“不沾锅”的犬儒主义思想视为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超对象的功能就在于揭发犬儒者或伪善者的面纱，试图表达“超越幻界”的可能性。在此，莫顿不认为有一个“域外”（a beyond）可远离尘嚣或有一个“纯真的自然”可以让我们超脱尘世。正因如此，他反对深层生态学者过度将自然“理想化”或“美学化”，让自己成为犬儒者或伪善者而不自知。莫顿指出暖化怀疑论者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犬儒者和伪善者。举例来说,有一个小孩子忽然从家里冲出去,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卡车也突然从前面奔驰过来,那么在旁边的我们需要伸出援手吗?根据这个事件,我们可获致两个结论:(1)我们冷眼旁观,看看小孩子会发生什么事情;(2)我们帮小孩子拉一下,免于灾难发生。从全球暖化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不沾锅”的犬儒心态:我早就告诉你,小孩子不要乱跑,现在你活该。在《终结不爽》(*The End of Dissatisfaction*)中,文化批评家麦高文(Todd McGowan)指出,犬儒者的批判思考是一般哲学家常有的态度,但犬儒者是有症状的。他们的思考逻辑为:“既不是……也不是……”(Neither ... nor ...)。换言之,他们对诸多事物抱持不爽的态度,即“吃这个也痛,吃那个也痛”的犬儒症候。犬儒者是聪明的,一个“自以为是”且“早就知道答案的主体”(the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但这类人社会化不够,较爱独善其身,他们的启蒙无法带给社会改变,被喻为“一种虚无主义”(157),即“无启蒙的启蒙”(the unenlightened enlightenment)(McGowan 121)。莫顿让伪善者和犬儒者对话,指出犬儒者是一种“伪善者的伪装形式”(Morton 158)和“虚伪的虚伪”(Morton 156)。两者互为表里,不但是“失败主义”的表征,更是全球暖化持续的原因之一。讽刺的是,爱德蒙斯顿和班纳是属于此一类别的人。

莫顿《超物件:世界末日后的哲学与生态学》一书的第二部分是他用精神分析的角度针对全球暖化作为超对象的文化分析与批判,故莫顿以伪善的角度来补充犬儒主义。超对象让人有机会面对他者(包括毒物、死亡、非人、环境等),走出伪善。用莫顿的话来说,不管你喜不喜欢,人和非人被迫必须“共存”(co-existence)(Morton 143)。这也说明人的伦理判断就在自我与他者的“接触”中作抉择;在此同时,我们看到“物和现象界、思想和行动”之间的断裂,以及伦理选择时刻的迟疑现象(Morton 143)。

三、气候变迁:从“理所当然”到“伦理关怀”

暖化的问题是灾害防治的问题,也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讲的“管理”(governmentality)的问题。尽管皮克对二氧化碳的了解虽然指向“危险”或“风险”,他的证据是科学的。他与阿布博士结识,成为情侣。阿布博士是芬兰裔的美国人,一位“毁灭先知”(a prophet of doom)、“灾难社会学家”(a sociologist of disaster)(72)。两人第一次在“自然事件与人类事务”的会议中相互认识。阿布有瓜子脸、高高的颧骨、小圆嘴、直鼻子,虽称不上美丽,但非常耐看(69)。由于被爱德蒙斯顿和班纳排挤(172),阿布博士帮助皮克正名,恢复职位。由于天气改变,地球似乎正从所谓的“绿色状态”(Condition Green)走向“金星状态”(Condition Venus),这使得爱德蒙斯顿和班纳两人的阴谋终告失败:“人算”有时不如“天算”。

本书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工业革命之后缓慢上升。1900年之后,二氧化碳上升的幅度则较为明显。到了七十年代,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飙高9倍

之多。根据作者的猜测，此一时期二氧化碳的浓度约 340 ppm，但两千年之后，二氧化碳浓度的预估值可能会达到 400 ppm，而且全球温度甚至增加到 1.8 度左右。换言之，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继续增加，那么将有所谓的“全球热浪”（global heating）。果不其然，拉图尔指出，2013 年 5 月 7 日《世界日报》（*Le Monde*）报导，二氧化碳已测得 399.29 ppm 的浓度。在这样的人类纪发展下，暖化现象将会影响社会群体生活和活动（Latour, “Agency” 1）。荷索《热浪》所预估的二氧化碳浓度的发展大体上是正确的。很明显地，暖化在此暗指风险，它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产物。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认为，风险其实有“危险”（dangers, hazards）之意，凡能对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造成伤害的现代性结果均可称为风险（Beck, *Risk Society* 13）。因此，风险既是“除不尽余数”，也是“并发症”。贝克的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之后的接续。对贝克而言，风险是现代化的后果；因此，它可能是“真的”；在工业社会中，它表达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内在矛盾（13）。贝克的风险社会其实是一种“反思现代性社会”，他能观察到现代性和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慢性危机”（slow crisis）（3）。正因如此，贝克创造“第二现代性”，尝试解决“第一现代性”（工业社会）所产生的生态危机。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从尼克松的角度来看，工业社会或第一个现代性所制造出来的“慢性危机”，最后会逐渐变成“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Nixon 2）。

风险不是猜测，而是一种实际操演，更是一种（自我）反思的批判。在《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中，贝克提供风险的八大定义（Beck, *World Risk Society* 147）：（1）风险不是代表世界毁灭或绝对安全，而是一种真实的虚拟性；（2）风险会对未来造成危险；（3）风险是一种数学道德，既是事实，也是价值评估；因此，有风险就可保险；（4）风险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不确定性；（5）风险是一种认同的冲突；（6）风险是“全球地方性”（glocal）的；（7）风险隐藏着潜在症状；（8）风险是超越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体（hybrids）¹。

拉图尔和贝克两位环境社会学家均关心生态议题，但两者的切入点不同：拉图尔的社会学是人与非人的集合体，而贝克的风险社会是自由派人文主义的社会。对拉图尔而言，贝克的风险社会存有两大问题。第一，贝克的风险社会是人本中心的社会，强调“人性、太人性”的社会，非人将被排除于社会之外，难有角色扮演的可能性。第二，贝克的“反思社会”过度强调人的“反思”和人的“世界”（cosmos）（Latour, “Whose Cosmos?” 453）。表面上，贝克强调“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但他的世界观依然如故，总是排

1 贝克的集合体（hybrids）一词源自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但两者论述基础不同：贝克是在“风险社会”的架构下企图解决生态问题，而拉图尔则在“物的议会”（the Parliament of Things）则呼吁现代议会政治也应讨论“非人”。

斥他者和非人世界。因此，哈门、莫顿和拉图尔等面向对象理论哲学家强调“对象的民主”（the democracy of objects）和物的能动性（material agency）：物、他者和非人也能与人“共同创造世界”（co-constitutional）；也就是说，物或风险不应只是“黑盒子”或被视为“理所当然”（matter of fact）。相反的，物可以是“关心之事”（matter of concern）。如此一来，我们才能走出怀海德（A. N. Whitehead）所谓的“自然之二元离异”（bifurcation of nature）；也就是说，这些作家反对事实和情感分离乃属天经地义的自然事实，而且与社会所关心的事毫无相关。同样的，二氧化碳做为拉图尔的“关心之事”或莫顿的“超对象”，可让读者了解到“关心之事”可将“理所当然”的“潘多拉之盒”打开，成为另类“知识”的可能性。在此，“关心之事”是一种“情感”表现，存在于主体、环境和事物之间。同样的，二氧化碳作为一种超对象，在未来将会对社会集体产生影响。这也说明贝克的“风险社会”虽能帮助我们看出暖化问题，甚至应许协助解决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问题，但是和“人类纪”的隐喻一样，它的本质还是“人本中心”的想法。

在小说中，为了解决暖化的议题，美国总统旋将爱德蒙斯顿和班纳两位主管置换，同时他也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由皮克担任新的科学顾问。对皮克而言，要解决暖化问题需要从科学、政治和教育的角度着手。科技上，他建议建造“太阳能卫星”（solar satellites），在太阳和地球之间设立大型的反射镜，尝试将日光对地球所产生的热气反射至外层空间，因为皮克所建置的基地芯片的功能可透过激光的媒介，再回传给绕行于地球上的卫星，将热能传导回外层空间。如此一来，这些球状物体就可将热能传回外层空间。皮克的安排让美国很多地方都设立类似的设备，以降低热污染，例如圣地亚哥、长岛以及其他地区。除了科技的创新之外，皮克也试着加强一般大众对暖化的了解，自己俨然成为“能源沙皇”（energy czar）。此外，皮克认为美国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应该要改变，鼓励民间节能减碳，希望美国人民过着简朴的生活。皮克的新的能源安全意识将会带来社会的改变；因为改变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皮克的暖化思考在七十年代有其历史性。他的解决方式是在科技、能源和教育上着手，与《成长的极限》想法相似。1968年，一个非正式、无形的组织“罗马俱乐部”成立，其主要目的在于重新审视“人类的条件”，包括军事主义、环境恶化、人口爆炸和经济衰退等问题。罗马俱乐部主要关心的重点有五大趋势：工业化、人口增长、营养不良、资源耗竭、环境恶化（26-27）。罗马俱乐部在事件的陈述上虽辅以客观统计数字，但其语气仍是“道德劝说”。正如本书前言所提到，“如果我们要维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孩子所属的星球，我们就需要一致的行动”（12）。在此，他们所了解的极限是一种限制、一种界线。然而，界线虽有“限制”之意，但它也是走向“前沿”的可能性。

结论：气候伦理学

气候变迁的科学研究成果约莫于八十年代末期才逐渐受到重视。1988年6月23日，美国参议员韩森（James Hansen）在《纽约时报》报导一则骇人的消息：今天，全球暖化的机制业已启动。尽管有科学家在十九世纪末已经表明全球暖化是人为的，然而，到了20世纪末，这样的科学报导还是未能形成共识，而韩森在听证会所投下的震撼弹无意中开启了“气候战争”的序幕。

有关气候变迁的辩论主要聚焦在科技和经济的问题上面，尤其是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IPCC）的第四次报告（AR4）指出，暖化现象若是持续下去，将会影响穷人，而弱势团体因暖化之故，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暖化会造成海平面上升，引起岛国走向国家灭亡的命运，同时，沿海地区居民也会因暖化导致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食物短缺、水资源浩劫等问题。很明显地，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处理全球暖化议题是重要的。气候变迁也会带给非人世界诸多问题，包括冰山融化、北极熊的栖息地消失、生物多样性消失，以及更多的飓风和其他天然灾难。本文一开始所提及的超对象，以及这些因暖化问题所产生的人与非人的气候伦理学问题，将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应气候变迁所作出的“伦理选择”主要是根据情动力（affect）的表达。¹ 根据史宾诺莎（Spinoza）的《伦理学》（*Ethics*），情动力是一种迈向他者，迎接“遭遇”（encounter）的情感，而不是一种封闭性的自我保存力量；因此，它既是一种关系诗学，表达身体潜能 / 力量表达的过程（Gregg and Seigworth 1-2）。在《史宾诺莎》（*Spinoza*）一书中，德勒兹把情动力视为“能影响和受影响的力量”（the power to affect and to be affected）（20）。在这个定义下，主体和环境是共伴的，气候系统与人的系统也是息息相关，彼此相互影响。从气候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和气候改变也是共同演化的。作为暖化对象，二氧化碳会从人类“关心重点”变成“照顾重点”，而且人类也会因气候变迁所导致的相关灾难做出“伦理选择”。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伦理（ethics）和道德（morality）两个概念是互通的。其实，这两种观念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个人的，后者是超个人的。² 理论上，莫顿的超对象是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事实与虚拟的临界点上移动；它是超国家、后政治、跨越边界的。荷索的《热浪》将可叙述性（narrativity）、伦理、超对象和气候事件紧密结合在一起，激发由伦理关怀所衍生的责任感，因为气候

1 “伦理选择”为聂珍钊教授所铸造之新词，第34页。

2 美国副总统高尔（Al Gore）认为，“全球暖化的挑战也是伦理的挑战”。对高尔而言，气候变迁与其说是政治议题，不如说是“道德议题”。同样的，贾丁纳（Stephen M. Gardiner）也认为气候变迁基本上是伦理学的议题（Gardiner et al. 3）。

系统和人文系统互为生命支持系统；因此，由气候变迁所延伸出来的法律、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也须一并考虑。当人类纪来临时，气候变迁和暖化的问题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或当灾难来临时，它只能变成“公共领域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贾丁纳（Stephen Gardiner）指出美国的人口是全球的4%，却制造了约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而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竟然不理睬“京都议定书”（The Kyoto Protocol）。同样的，小说也批评美国总统对暖化现象采取被动的态度。很明显的，从超对象的视角来阅读荷索的《热浪》，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末世论、风险理论、伪善和犬儒等观念的内在矛盾，而且还可以尝试走出道德主义的幻象，期能改变社会对暖化议题的态度，让人与非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而且超对象亦可成为“关怀之事”。

【 Works Cited 】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Beck, Ulrich. *Risk Society*. Trans. Mark Ritter. London: Sage, 1992.
- .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1999.
- Burke, Edmund.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London: Routledge, 2008.
- Crutzen, Paul J., and Hans Günter Brauch, eds. *Paul J. Crutzen: A Pioneer on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Anthropocene*. Berlin: Springer, 2016.
- .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415 (2002): 23.
- Deleuze, Gilles. *Spinoza: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 Robert Hurle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88.
- Gardiner, Stephen M., Simon Caney, Dale Jamieson, and Henry Shue, eds. *Climate Ethics: Essential Readings*. Oxford: Oxford UP, 2010.
- Gregg, Melissa, and Gregory J. Seigworth, eds.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Durham: Duke UP, 2010.
- Heilbroner, Robert L.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Looked at Again for the 1990s*. New York: Norton, 1974.
- Herzog, Arthur. *Heat*. New York: Authors Choice P, 1977.
- Kant, Immanuel. *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lim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60.
- Kellogg, William.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fluence of Man’s Activities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Ed. S. Fred Singer.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13-23.

Latour, Bruno.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New Literary History* 45.1 (2014): 1-18.

—. "Whose Cosmos, Whose Cosmopolitics?: Comments on the Peace Terms of Ulrich Beck." *Common Knowledge* 10.3 (2004): 450-462.

McGowan, Todd. *The End of Dissatisfaction*. New York: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4.

Morton, Timothy. *Hyperobject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3.

Nixon, Rob.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e: Harvard UP, 2011.

Singer, S. Fred, ed. *The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Snyder, Gary. "Four Changes." *Turtle Islan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4. 91-102.

Trexler, A. *Anthropocene Fictions: The Novel in a Time of Climate Change*. Charlottesville: U of Virginia P, 2015.

责任编辑：张连桥